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战略视角

新时代的印度与中国

□辛 格

能够应邀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我深感荣幸。我很清楚贵校在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拥有怎样独特的地位，以及为中国社会的卓越转型作出了何等贡献。你们中的许多人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中国的未来发展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我看来，在贵校谈论“新时代的印度和中国”，是再合适不过了。

印中关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两国都有着传承至今的古老文明。两国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联系源远流长。印中大约在同一时期踏上了各自政治历史的崭新阶段。今天，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中都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推进着各自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印中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中国早期的经济改革及其令人瞩目的成就激励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印度一直紧随中国之后，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过去20年，印度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过去10年，印度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印中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数倍，已经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分别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并帮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此外，印中还以各自方式参与了全球经济塑造——中国靠的是制造业，印度则以服务业见长。

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经济改革进程经历了严格民主辩论的锤炼，也经受了寻求政治共识和公众支持的考验。印度经济改革政策的重点不仅在于注重加快经济增长，同时也注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印度不仅强调现代化，还重视应对挑战，即如何为人口众多且多样的印度人民提供平等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能力。印度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向前发展。

在结构方面，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推动。在融资方面，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本国资源。但印度正在逐步融入全球经济。正如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印度也受到了此次持久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我相信影响会是暂时的。近几个月来，印度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吸引外国投资流入，加快实施重大项目，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金融市场并推进税制改革，这些都使我们的商业环境更具吸引力。我们的目标是努力确保印度经济重回每年7%~8%的持续增长。我们认为印度经济的基本面——特别是投资和储蓄率——是强大的，是与这一预测目标相一致的。

在我看来，印度未来将要面临的关键挑战，正是印中合作的大好机会。在这方面我想强调八个具体领域。

第一，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基础设施的扩建和现代化。印度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1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这方面有着雄厚的资金和实力，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投资。

第二，我们需要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减少城乡差距，并有效管理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城市化是印中共有的现象，需要特别注意水和废物的处理。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两国的国家规划人员、城市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应当分享彼此经验，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口流动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挑战。

第三，我们希望借助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实力，来为印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印度在服务业、创新行业以及某些制造业领域颇有实力，可给中国带来利益。对于印度来说，与此相关的挑战是技能培训，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经验。



张永/摄

第四，印中作为两个能源消费大国，能源需求庞大且在不断增长，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挑战，包括共同开发可再生能源以及与第三国合作开发可再生能源。

第五，人口增长与耕地萎缩，消费提高与价格波动，都使得粮食安全成了印中必须优先考虑的一项重要政策。印度已经发起了一项以立法为基础的重大粮食安全计划。印中应该在这方面集中各自的资源和专业知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在一个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印度和中国可以共同努力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并通过利用两国资源及两国的巨大需求、发展规模经济和不断提升收入水平，来保障两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六，在一体化的世界当中，经济成功需要良好外部环境的支持。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印度和中国一直是开放的全球经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及全球金融、信息和技术自由流动的最大受益者。然而，新的全球经济环境可能不像近几十年那样有利。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使国际经济环境朝着更加有利于印中的方向发展。请允许我着重阐述这一点。

受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我们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权力正在通过这场变革而广为扩散。一个多极世界正在兴起，但它的轮廓尚不清晰。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有所抬头，主要国家之间的区域性协定可能会将国际贸易制度切割得支离破碎。维护一个开放、一体化且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关系到印中的切身利益，尽管我们也正在共同努力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印中还应该加大对新兴市场的贸易和投资支持力度，并降低其风险。设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正是此类合作努力的典范。印中合作也将有助于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第七，当印中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欢欣鼓舞之际，我们也必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必须更加关注保护我们脆弱的环境。印度和中国都继承了重视自然环境的文明，千百年来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然而，当我们满足各自人民的基本需求时，我们也面临着强加给我们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公平负担。我们应确保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反应不至于限制自身的经济增长，我们应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

第八，印度和中国都受益于基本稳定的全球秩序与和平的周边环境。但是，我们不能将现在保持的两国所在地区内外的政治稳定和安全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细想一下，我们两国还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在印中周边兴起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对两国造成了直接影响，并且足以造成整个亚洲的动荡。同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对两国经济也至关重要，就像西亚和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两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一样。

最重要的是，印中两国都需要一个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亚太地区。全球机遇和挑战的重心正在向这一地区转移。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印度、美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共同体都将身处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列。虽然这一区域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活力和希望，但也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纠纷。建立合作、包容及基于规则之上的安全架构以增进集体安全，促进地区和全球稳定，将会符合各方利益。虽然印度和中国都是大国，都有足够的信心来自行应对面临的安全挑战，但两国合作应对将会使效率更高。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还可以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来实现，这也应该是印中两国的共同目标。

我曾在多个场合宣告，印度欢迎中国的崛起，而中国也欢迎印度的崛起，亚洲和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印中两国的发展和繁荣。

坦率地说，联盟和遏制的旧理论已经过时了。印度和中国是无法遏制的，两国最近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两国也不应该寻求相互遏制。我们都知道，合作的好处远远大于遏制可能带来的任何假定收益。因此，印中应该在平等和友好的精神之下与对方互动，应当相信对彼此不会造成威胁。这是印度对外交往的基本前提。我们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由印度自身的经济利益、需要和愿望决定，并非针对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印度期待中国也采取类似的做法。

25年前，拉吉夫·甘地总理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全新开始。从那时起，两国历届领导人都在这一历史性的开局之上不断建设。期间，两国关系蓬勃发展，合作范围不断拓展。这是因为印中做到了求同存异，并且总体上保持了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宁。与此同时，印中在解决边界争端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两国商定政治指导原则之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合理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框架。

印中关系的稳定为两国利用经济增长和开放带来的机会创造了基本条件。事实上，两国关系当中最有活力的方面始终是经济，中国已经成为了印度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当然，双方都有各自的关切——例如边境地区冲突、跨境河流调水及贸易失衡。最近的经验表明，这些问题将会阻碍印度和中国充分开发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于印中两国的持续进步和转变至关重要。

我相信，印中两国不仅有着共同命运，而且在进一步合作方面也有着无限可能。因此，请允许我就印中交往讲七点实用原则。相信这些原则将会帮助印中进一步加强合作。

第一，我们应该重申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本着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尊重彼此利益和主权以及相互同等安全的原则推进两国关系。印度欢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尼赫鲁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则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时代发展。在现代背景下，这一理念着重突出了各大国应基于互信互让、关注彼此核心利益并坚持通过和平对话解决所有未解决问题的原则来建立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也应该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第二，保持印中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一直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石。这一点对于建立互信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印中应避免破坏当前局面。事实上，印中可以通过履行协议和有效利用双边机制来实现这一点。与此同时，印中也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解决目前的边界问题。

第三，要加强在跨境河流和贸易不平衡等复杂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以加强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我们应该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和协商，本着透明的精神在地区和周边问题上消除印中之间的误解并积累积极合作的经验。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印中战略磋商与合作将加强本地区内外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第五，印中共同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应增进两国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上的政策协调及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等多边场合中的合作。

第六，印中应充分发掘两国在经济等各领域的合作潜力。

第七，印中应通过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相互熟悉，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成功。

就像美丽的七巧板有七个不同的形状一样，这七点原则可以编织出一个精美的挂毯，谱写印中关系未来更加壮丽的篇章。

印中昨天签署的协议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共同认可的这些原则，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作为有权决定公共政策的官员，我希望在座诸位都能留意并尽一切努力推进印中合作，立足您所在的岗位促进印中关系。

我经常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印中两国的发展愿望。在昨天我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中，习近平主席也赞同这一点。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印两国都在寻求发展、富强、繁荣，中国梦和印度梦是完全一致的。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会面，给了我很大信心。我相信印中可以共同实现这一愿景。

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印中两国共同繁荣起来。印中不是命中注定的对手，我们应该向世界更充分展示彼此希望成为合作伙伴的决心。印中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定义两国未来。这样做不容易，但我们为此必须不遗余力。因为我们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印中两国的未来，也关系到本地区和整个世界的未来。

（本文系印度总理辛格2013年10月24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

（上接第1版）

必须破除形式主义，不断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能打仗、打胜仗，说到底就是战场上打得赢、训练场上争第一。平时训战近一步，战时胜算就多一分。要构设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舍得在难局、险局、困局中摔打锻炼部队；要用好考核、比武、拉动机制，坚持在不打招呼的拉动考核中发现解决问题；要强化针对性、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坚决纠治危不施训、险不练兵，练为看、练为比、练为考等问题。

必须破除能力短板，造就高素质军事人才。战争作为敌我双方的活力对抗，人的因素至关重要。我们既要有能打仗的决心和想打仗的愿望，更要具备打胜仗的素质。必须抓好学习培训，充分发挥好院校的主渠道作用、教导（训练）机构的随营军校作用、岗位练兵的磨砺作用，在执行重大任务现场、比武考核赛场、实战化训练考场，培养和造就善谋打仗、能打胜仗的高素质人才群体。

始终保持战斗状态冲锋姿态

记者：习主席指出，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在实践中您感到应着力培养部队什么样的优良作风，如何培养优良作风？

赵宗岐：加强部队作风建设，说到底就是要打造军人特有的精气神，始终保持战斗状态、冲锋姿态，始终保持军人特有的血性和胆气。我感到，贯彻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必须大力培育官兵“五实”作风，着力打造官兵“五气”精神。“五实”，就是“对党忠实、思想求实、工作扎实、为人老实、作风朴实”；“五气”，就是“敢打必胜的勇气、一往无前的豪气、压倒一切的霸气、雷厉风行的虎气、昂扬向上的正气”。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部队绝对忠诚于党，真正做到平时敢“亮相”、战时敢“亮剑”。

培育部队优良的作风，一靠传统熏陶。要大力弘扬我军和军区部队在革命战争年代及和平建设时期形成的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弘扬“见任务就上、见第一就争、见先进就学、见问题就改”的优良作风，深入开展“战史·战例·战将·战功·战斗英雄”学习教育活动，努力传承红色基因，永葆政治本色。二靠训练锻造。优良作风既是教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更是训出来的。古今中外无数战例证明，一支具有勇敢顽强敢打必胜作风的部队，其战斗力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敌人。要秉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要求，经常把部队拉到艰苦陌生地域摔打，置于复杂电磁环境磨砺，放在逼真战场条件下锤炼，让官兵不断挑战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锻造不怕强敌、不畏艰险的过硬战斗作风。三靠执纪严明。当前突出问题是，不缺法律而缺法治、不缺纪律而缺自律。培树优良作风，必须敢唱黑脸、敢下狠手，尤其对不良倾向和苗头问题，要出重拳、动真格，以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弘扬清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四靠领导带动。一个单位领导的作风，决定和影响着整个单位的作风，领导带头关键是主官和主管带头。具体应做到“八个带头”。带头学习提高，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带头聚力打赢，把帅旗插到训练场，把黑脸唱到训练场，把水份挤出训练场，把关爱送到训练场，不断强化抓打赢的第一职责和能打赢的第一本领。带头调查研究，帮助各级挖“病根”、找“药方”，拿出有效对策办法。带头务实创新，敢为人先，勇于攻坚，努力破解制约强军实践的矛盾难题。带头较真碰硬，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不解决问题不撒手。带头廉洁自律，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带头践行宗旨，端正对官兵的根本态度，善于解难帮困。带头解决问题，在立说立行、边整边改中破解顽症痼疾，促进作风转变。

◆环球瞭望

英国“以房养老”的瓶颈

□郭芳翠

“以房养老”在英国被称为“房产价值释放机制”（Equity Release Mechanism，ERM），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身抵押贷款（Lifetime Mortgages）和房屋反转计划（Home Reversion）是英国“以房养老”政策最主要的两种产品。终身抵押贷款是指拥有房产但无收入的老年人将房屋抵押给银行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从而获得贷款，等老人去世之后，贷款公司将出售房屋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剩余的价值留予继承人；房屋反转计划是指老人将房产整体或部分出售给贷款公司，获取资金用于养老，辞世之后，贷款公司将拥有已出售的房产，未出售的部分归继承人所有。近年来，“以房养老”在英国还出现了出售大房，换购小房，用差价来养老的新形式。

“以房养老”政策在英国的发展是曲折的。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房产价值释放机制”，因“无追索权保证”，在1990年被英国政府宣布为非法产品。直到2001年英国政府才支出8500万英镑预算重新启动“房产反向抵押贷款”计划，并于2004年交由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接管，以加强监管。上月中旬英国政府提出流动资产在23500英镑以下的老年人可向居住地政府申请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项目。有了政府的资金援助和推动，“以房养老”在英国逐见起色，但远不如美国成功，这种发展境况既与英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也与植根于这种社会环境的、以保险公司为主力军的“以房养老”模式有关。

1948年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之后，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福利费用。据统计1951年到1975年间，英国福利支出增长约13倍，福利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20年间从14%迅速攀升到28%，加之经济发展缓慢，政府财政支出出现窘境，减少福利支出成了英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开始推动福利私有化和市场化，而这一政策在英国一直持续到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英国经济，2008年、2009年一度出现分别为-1%和-4%的经济负增长，2010年开始恢复，经济缓慢增长。同时，英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债务负担，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百分比从2008年57.3%增长到了2011年的101.2%总额，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削减福利开支。另外，英国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以来，英国65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连续5年高达17%，同一时期美国的比例则在13%~14%之间。所以，经济的不景气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为“以房养老”在英国的存活提供了基础，也催生了以保险公司为主导政府为辅的发展模式。

由保险公司主导，政府只起辅助性作用的发展模式，一方面缓解了英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老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保险公司经常面临资金缺乏的困境，英国经济衰退政府资金不足，保险公司有时候也会对高额贷款望而却步。这一模式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政府监管不到位以及相关法律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到位是1960年代中期“房产价值释放机制”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英国政府没有制定专门针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法律法规，对这一领域的法律约束只能来自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1974年颁布的《消费者信用法案》（Consumer Credit Act of 1974），但是这一法案只适用于金额在25000英镑以下的反向抵押贷款，且该法案的许多规定烦琐而严格，增加了“房产价值释放机制”运作的成本和复杂程度。因此为了规避这个法案，许多贷款机构只发行价值在25000英镑以上的产品。现实情况确是25000英镑以下的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一法案并不健全，既有为老年群体参加“以房养老”计划提供保护之功效，也有阻碍该计划运行之弊端。

其次，历史因素在英国“以房养老”政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房产价值释放机制”失败的阴影挥之不去，部分老年人对“以房养老”政策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以房养老计划在英国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以房养老”的观念逐步被英国人所接受，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1960年代中期英国实行的“房产价值释放机制”计划，其产品缺乏“无追索权保证”等条款的保护，参加该项目的老年群体并没有从中获益反而增加了其债务负担。这是因为，老年人签约之后，获得的并不是现金而是投资债券，贷款机构将资产进行投资，企图获利，但是随后英国经济的衰退和全球股票的大跌价，导致该计划破产，沉重的负担推给了参加该项目的老年群体。1990年代英国政府宣布该产品非法，尽管可以根据投资者补偿办法进行补偿，但仍有部分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一时期的失败，造成了英国人对“反向抵押贷款”计划的不信任，但半个世纪之久的存在，“以房养老”产品设计的改进以及政府的监管，也使得房产反向抵押贷款计划彰显了其价值，“以房养老”的观念在英国基本上被接受。去年底，一份调查显示，超过1/3的英国人打算利用房产筹集养老金，而同时期，欧洲大陆有类似想法的人却不到1/4。

此外，英国社会还有其他一些“以房养老”的有利条件。如今年一项调查显示，73%的英国退休老人都是“有房一族”，其中26%的人正在找机会卖房，卖房者中73%的人表示想换一套更小一点的房子。在被调查者中，有23%的人希望卖房以增加收入，13%的人希望靠房子偿还债务。同时，英国的房子不存在使用年限的问题，而且相关金融服务机构在这一领域已运作多年，其操作逐渐规范。

无疑，英国具有“以房养老”存在的土壤，但也不能掩饰其发展的瓶颈之处。根本上来说“以房养老”在英国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复苏和政府的支持。如2001年4月英国政府为“以房养老”计划提供8500万英镑的预算支持，2004年10月1日英国金融服务局接管反抵押贷款事务，并将产品名称改为“终身抵押贷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对“以房养老”计划的信任，推动了其发展。新一届联合政府曾承诺老年人可向政府申请房产抵押贷款，但该计划尚未实施却又对流动资产设定了上限，究其原因也是经济的不景气以及英国政府坚持的福利私有化政策所致。